

實施衛生合作計劃，也同時進行學童口腔檢查和治療，以該校的兒童為對象，將頭顱顎之發育、齒列的形態及發育為兩大長程研究的主題，設計很多研究專題，除我自己從事外，同時也充當為同仁的研究課題。此外，我專門中最得意的牙科公共衛生、台灣人牙齒疾患的疫病學統計和氟化物的蛀牙預防，當然也充作研究題目一起進行。

這些論文的研究工作能得到滿意的成果，除應歸功於從事的人均具有才能的優秀人員外，他們對這困苦的工作，更能熱心緊跟著追趕，才是最大的理由。譬如：楊博正醫師在舊系址的二樓會議室，做頭部研究的測量工作，經常超過晚上 12 點還在工作。後來於 1969 年 2 月號的台灣醫學雜誌刊載有關“中國學童上下頷之發育變化”的論文一篇，被選為該年度最優秀論文，而得到“杜聰明博士還曆獎學基金論文獎”的榮譽。

現在回顧我所指導有關各醫師升等的論文，自從民國 58 年至我卸下主任職止，如：有關頭部頷部形態發育的著作 11 篇、有關齒列及其發育的著作 7 篇、牙科衛生關係的 3 篇、連其他題目的算在內計有 27 篇的數量，同內容的性質所成的記錄，可如實的說明這中間所花的努力結果。再者，那時代升等論文著作者如有兩名以上，審查者對它的評價將會比只一名的較低。因此，對所有和升等有關連的論文著作，我都謙辭在題目下連名著者，以免影響成績，僅於論文末尾括弧，以指導者的名字附記之。不過也有粗心的醫師，連這個指導者的名字都忘記提了。

民國 72 年 7 月 24 日，郭水教授基金會編印的“郭水教